



# 许宝騄先生 家世及轶闻

陈大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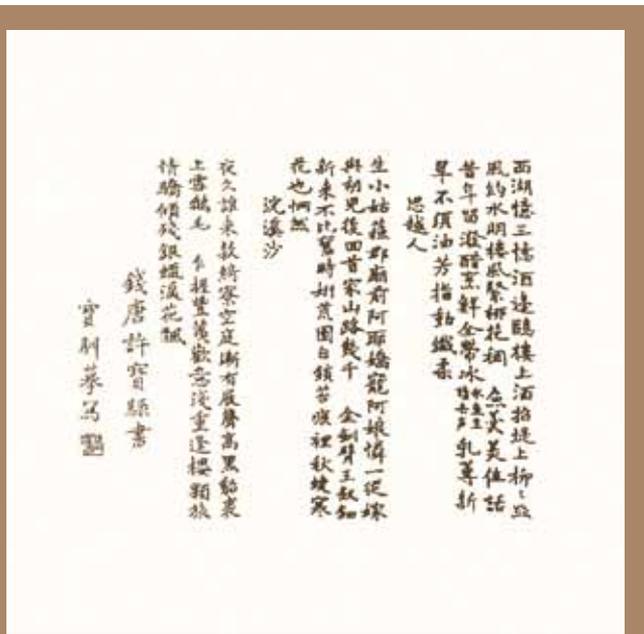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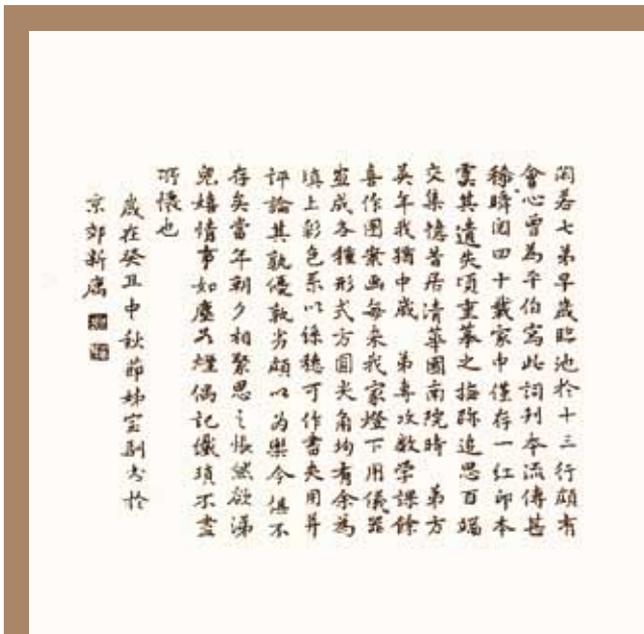
编者注：去年是我国概率统计事业的奠基人许宝騄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北京大学举办了一系列活动，出版了纪念文集《道德文章垂范人间》一书。本文作者细读此书，搜集整理，从不同侧面勾勒出一代宗师鲜为人知的真实人生，可与陈家鼎教授和郑忠国教授合写的《许宝騄先生的生平和学术成就》一文对照阅读。

许宝騄先生（1910-1970）是我国概率统计事业的奠基人，与华罗庚、陈省身同龄，早期经历也很近似，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解放后任北京大学一级教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然而许先生体弱多病，英年早逝，除了四十余篇已发表的论文、三部专著和少量手稿，几乎没有留下其他遗物。去年北京大学概率统计系为给许先生塑像，所能收集到的照片，只有区区五六张。世人对其学术成就了解不多，对其个人情况所知更少。多数回忆文章只谈他聪明过人，学问精深，诲人不倦，其他方面就语焉不详了。“对于无缘亲聆他教诲的同学们，许先生基本上是一位传说中的英雄，多少有些神秘的”。<sup>[8]</sup>然而细读他同龄人的叙述，我们还是能够感受到这位卓越的学术大师多姿多彩的鲜活形象。“他的生活环境、家庭背景，对于他的学术是有很大影响的。从他的生活经历可以看出，许先生的学术成就具有深厚的文化背景。”<sup>[6]</sup>

许先生祖籍浙江杭州。杭州许氏源出富阳沈氏，居杭始于明代，清代家族鼎盛。自第十世起以“学乃身之宝，儒以道得民”一联十字取名排辈。高祖许学范，乾隆三十七年（1772）进士，其子乃济、乃普、乃钊为进士，另四子为举人，故有“七子登科”之誉。乃普之子许彭寿（即许寿身）及其堂弟许庚身也是进士。许宝騄先生的曾祖许乃恩系“七子登科”中最小一位，道光癸卯举人，官至山东知县。祖父许祐身，同治十二年举人，历任工部右侍郎、屯田司主事、都水司员外郎、御史、山东道监察御史、江南道监察御史、京畿道监察御史、江苏扬州府知府等职；父许引之，字汲侯，自清末至民国北洋政府期间历任中级官员，官至两浙盐运使。

许宝騄先生排行第七，有两兄四姐。长兄许宝驹（1899-1960），字昂若，北京大学国文系毕业，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历任国民革

命军第十八军党代表、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特派员、浙江省政府秘书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等职。1941年，与屈武、王昆仑等组建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坚持抗战，反对分裂。1948年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解放后，任民革中央常委，浙江省人民政府委员，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sup>[9]</sup>。次兄许宝騄（1909-2001），燕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在广州、北京多所大学任教，是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发起人之一。1945年任《正报》主笔，参与“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地下组织，并在争取北平和平解放的过程中开展了积极有效的工作；1951年任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总团副秘书长。历任民革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团结报》总编辑、社长等职；是第二、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曾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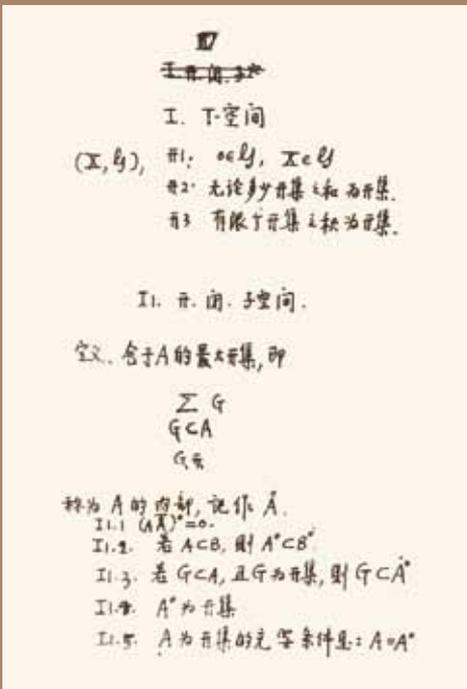


许宝騷先生的大姐许宝驯（俞平伯夫人，俞润民之母）于1973年所写的纪念文字。“闲若”指许先生。

许宝騷先生年青时抄写着著名学者俞平伯的著作《古槐书屋词》。许先生的大姐许宝驯于1973年按许宝騷的手迹摹写。



著名文学家俞平伯先生的纪念题字



许宝騷先生于1963年向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概率统计教研室的青年教师系统讲授“点集拓扑”，这是当时手稿的首页，手稿现存北京大学档案馆。



许先生的亲属中，堂兄许宝蘅（1875-1961）系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举人，晚辈中有台湾著名作家高阳（原名许儒鸿，1926-1992），其作品《胡雪岩》、《红顶商人》等在大陆风行一时。

“七子登科”的同时还有“五凤齐飞入翰林”。许祐身的姐姐嫁给了礼部尚书廖寿桓，妹妹许禧身则嫁给晚清末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陈夔龙。通过联姻，许家亲戚中还有多位社会名流，其中就包括清朝大学者俞樾（1821-1907）。

许先生的祖母是俞樾的二女儿俞绣孙，其诗词遗稿《慧福楼幸草》因被俞樾编入《春在堂全书》而传世。许先生的姑姑许之雯，聪颖异常，“幼读蕲塘退士所选《唐诗三百首》，未半即会吟咏。所吟诗句，工整之中，有秀逸之气。”其诗集由俞樾选刊，名为《绡芸

馆诗钞》。另一位姑姑许之仙则嫁到俞家，为俞樾的孙媳妇、著名红学家俞平伯的母亲。1917年许先生的大姐许宝驯嫁给俞平伯（1900-1990）。因此可以说杭州横河桥许家与浙江德清俞家世代通婚，是典型的江南士大夫家族之间的特殊关系。许先生年轻时多与俞平伯游，俞平伯先生的《略谈杭州北京的饮食》一文说到，“（平伯）于二十年代，有《古槐书屋词》，许宝騄写刻本。《望江南》三章，其第三记食品。今之影印本，乃其姊宝驯摹写，有一字之异，今录新本卷一之文。”

许先生喜爱昆曲，到了“逢会必唱”的地步，“年青时还粉墨登场过呢”。老舍先生在其《滇行短记》中写道：“宝騄先生是统计学家，年轻，瘦瘦的，聪明绝顶。我最不会算术，而他成天地画方程式。他在英国留学毕业后，

即留校教书，我想，他的方程式必定画得不错！假若他除了统计学，别无所知，我只好闭口无言，全没办法。可是，他还会唱三百多出昆曲。在昆曲上，他是罗莘田先生与钱晋华女士的‘老师’。罗先生学昆曲，是要看看制曲与配乐的关系，属于那声的字容或有一定的谱法，虽腔调万变，而不难找出个作谱的原则。钱女士学昆曲，因为她是个音乐家。我本来学过几句昆曲，到这里也想再学一点。可是，不知怎的一天一天的度过去，天天说拍曲，天天一拍也未拍，只好与许先生约定：到抗战胜利后，一同回北平去学，不但学，而且要彩唱！”许先生的昆曲爱好源于其深厚国学底蕴，就读清华大学期间，与其兄许宝驹、许宝骅、大姐许宝驯、四姐许宝騄都参加了其姐夫俞平伯组织的谷音社，“研习昆曲，同人会唱，宝騄与焉。

宝騄品娴音律，辨音极准，每听一曲，不数遍即能写出其工尺谱，试之不爽。能操二胡，时复一弄，用以自娱”，<sup>[1]</sup>由此可以想象他是一位很有生活情趣的学者。他还擅长桥牌，这在当时是很时髦的。但“经常感到生活中的广泛爱好与献身科学之间的矛盾。”<sup>[4]</sup>

许先生幼时体质虚弱，对他后来事业生活都很有影响。在清华念书时体重不足 40 公斤，1933 年大学毕业，参加赴英庚款留学考试被录取，却因体重不足而落选。1948 年夏曾因胃溃疡和肺结核而住院治疗，其严重程度足以令他至少病休一年<sup>[7]</sup>，但 1949 年初解放军进城时就已出院<sup>[3]</sup>。1952 年再度住院；1955 年他讲“概率论”课，只讲了三次，身体就不行了，只得由赵仲哲代上。赵是许先生的第一个研究生，1951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从此以后，许先生未能到教室上课，改为在家里开设讨论班，“他大部份的时间是在床上过的，念书和写作时，面前放一硬纸板，背靠着软的靠垫，在床上工作；吃饭和参加讨论班时，下来坐在沙发上。”<sup>[5]</sup>1957 年因肺结核恶化，在离北京大学很近的黑山扈疗养院住了几个月。1963 年，X 光检查发现他肺上有空洞，并且他带的菌具有抗药性。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学生的体育锻炼都应通过劳卫制才算达标，他曾自嘲说自己也通过了劳卫制，“因为我有痨病（肺结核）、胃病和痔疮。”“许先生身高 1 米 76，但体重只有 70 斤”，<sup>[5]</sup>腿很细，“最后两年，双腿肌肉萎缩，瘫卧在床，犹复孜孜不息。自言身虽残废，脑尚健好，生命力还很旺盛，尽能生活工作下去。”<sup>[1]</sup>

许宝騄先生终生未婚。其中原委，已不可细考。据其兄许宝騄称，“宝騄幼年时，父亲曾为主与南方老亲某氏女订有婚约。其后父亲去世，举家北迁，宝騄稍长，乃坚决要求退婚。母



许宝騄先生和他指导的“排队论组”（北大数学力学系 1954 级）师生合影。前排是许宝騄（左）和胡迪鹤（1959 年 7 月）。

亲强之不听，无可奈何，只得勉为提出解决。”<sup>[1]</sup>另据俞平伯之子俞润民先生回忆，润民先生有一姑父名叫郭则澐，是清朝翰林，曾在北洋政府徐世昌处任秘书长。郭有一女儿，与许先生年龄相仿。按中国旧的传统来说，许先生比这位郭女士长一辈。虽然辈份不合，但郭则澐与许先生父亲在北洋政府时期是同事，郭认为作为儿女之事也是合适的。据推算，1936 年许先生留英以前，两人已有往来，但相处的时间并不长。郭则澐去世后，其子反对这桩婚姻，旧社会由男的当家，长兄如父，这样许先生的婚事就告吹了<sup>[6]</sup>。1947 年许先生从美国回来，曾经订婚。著名统计学家奈曼（Jerzy

Neyman, 1894-1981；美国科学院院士和英国皇家学会院士）在其回忆录里也说许宝騄回国与恋爱有关。“据润民先生回忆，许先生给俞平伯先生的信中提到他采取的策略是‘以退为进’，现在已搞不清楚以退为进的具体含义。但这四个字是很合乎许先生的性格和他的用语特征的。”<sup>[6]</sup>“诂料不久发现身染肺疾，乃复废约。此后终身未娶。”<sup>[1]</sup>

许先生 1945 年赴美访问之前，与长兄宝驹一夜倾谈之后，深受宝驹的影响，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宝騄的两位兄长宝驹、宝騄都是这个组织的发起人。许宝騄先生



许宝騄先生和他指导的“统计组”（北大数学力学系1954级）师生合影。前排是许宝騄（中），张尧庭（左二），卢崇飞（左四）。

在美国为该组织联系海外华裔进步学者而积极活动，曾介绍著名气象学家涂长望参加组织<sup>[1]</sup>。1947年许先生谢绝美国同事的挽留回到国内，“希望成为他祖国即将诞生的新社会的一个成员。”<sup>[4]</sup>“在1948年辽沈战役后，许先生已确信‘国民党败局已定’，并对当年北大、清华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十分同情。”<sup>[2]</sup>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许先生委托江泽培致电国外友人，称“解放以后感觉幸福”（Am happy after liberation）。<sup>[3]</sup>

在西南联合大学和访问美国期间，许先生以其高超的学术造诣深深影响了周围一批学生，包括钟开莱（Kai Lai

Chung, 1917-2009）、王寿仁、徐利治、安德森（T.W. Anderson，斯坦福大学统计学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莱曼（E. L. Lehmann, 1917-2009，加州大学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奥肯（I. Okin）等。他们的学生更是遍及世界各地，影响广泛，他们后来都在不同场合撰文表达对许先生的感激之情，尤其是许先生与钟开莱的师生之谊，堪称典范。钟开莱于六十年代以后长期任斯坦福大学数学系教授，著有十余部专著，为二十世纪后半叶最有影响的概率学家之一。一些概率学家（如笔者的导师）虽不出其门下却深受其影响，尊他为“学术教父”。钟恃才自傲，入其法眼者，寥

寥无几。他早年就读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物理系，后转学到了数学系。据徐利治先生讲，当年西南联大学生转系非常普遍而自由，学不下去的学生要转系，学的不过瘾的学生也要转系。在数学系，钟开莱师从华罗庚先生研究数论。钟与华都颇为自负，华罗庚出的论文题目钟觉得不满意，钟就自己找题做<sup>[2]</sup>。钟毕业之际得到许先生的赏识，留校成为北京大学的助教。当时西南联大合署办学，三校互通有无，亲密无间，但教员学生还都分属于各校的。许钟二人经常在一起切磋，“还讨论过 Keynes 著作的翻译问题。看来他俩对 Keynes 的概率论基本思想都是比较赞赏的。”<sup>[2]</sup>1945年两人先后到了美国的不同地方，从此天各一方，大概没再见过面，但还通信讨论数学问题。也许因为两人都籍隶历史名城杭州，“都对中国古典文学有深深的爱好和素养”，“都能写出典雅的中文文章和英文文章”，“他俩之具有高水准的东西方复合型文化的教养与素质，都是事业成功的重要因素，也是两人间师生友谊经久不衰的原因之一”。<sup>[2]</sup>钟开莱后来一直以许先生的学生自居，并尽其所能宣传许先生的成就。“许先生对相互独立随机变量早有深刻研究，在1947年独立于格涅坚科对于行内独立的随机变量阵列，在加项一致可忽略的条件下，给出了行和弱收敛于给定的无穷可分分布的充分必要条件，而且在方法上很有特色。”可能是因为晚于格涅坚科的缘故，许先生的结果未曾发表。1968年钟开莱翻译格涅坚科和柯尔莫哥洛夫合著的《独立随机变量和的极限分布》一书，将许先生的手稿作为英译本的附录公开发表。1979年钟开莱与两位美国统计学家在统计学的顶级杂志 *Annals of Statistics* 上发表纪念许先生的文章，并从多元统计、统计推断和概率论三个方面全面系统阐述许先生的成就。钟开莱还在统计

学家江泽培和郑清水的协助下，编辑英文版的《许宝騄选集》，把许先生在解放后所写的全部中文论文译成英文，由德国斯普林格出版社出版。

可能是因为单身的缘故，许先生一日三餐多采取包伙的方式。西南联大期间，“与罗常培、郑天挺、袁家骅诸先生游，合伙包饭，仅履粗粝。偶思‘打牙祭’，欲烹调而苦无锅釜，乃以洗面盆盛鸡豚煮食之，谓之‘吃脸盆’。”“其时宝騄生活艰苦，营养不足，体力日渐削弱”，<sup>[1]</sup>“1943年-1944年许先生给老师奈曼(Neyman)的信中曾提到过挨饿之事”。<sup>[4]</sup>据说他每次唱完昆曲，便去小饭馆用膳。在解放前后他包伙的小饭馆名叫“菜根香”。后来身体每况愈下，“每天主食只吃2两或3两，

靠一磅半牛奶维持所需的营养”。<sup>[5]</sup>

许先生平时穿什么衣服？这是我们塑造铜像时遇到的一个问题，最后决定让铜像配上中式对襟衫。“从风度和气质来看，他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sup>[4]</sup>但他又是同时代人中间较早较多接触西方文化的，“非常喜欢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一起交流”。<sup>[4]</sup>他11岁开始学英文，高中时学过法语，大学毕业后曾担任来北京大学访问的哈佛教授Osgood的助教。留英四年使“他习惯在下午一点喝一点牛奶红茶”。<sup>[3]</sup>从照片上我们看到许先生穿西服、穿衬衫，“在昆明时期，他喜欢穿一件风雨衣出外散步。”<sup>[2]</sup>1948年8月他在给美国同事Herbert Robbins的信中曾写道：“请把您读过而又不准备

收藏的任何杂志（如《生活》），还有纽约时报的某些合订本，用最便宜的方式邮寄给我。”<sup>[7]</sup>这从一个方面反映出他对西方文化也同样很有兴趣。

1970年12月18日许先生孤独地病逝于北京大学佟府他的住所，“一只断去‘Parker’牌号的旧金笔弃置在床头小几，数页有著未竟的残稿散落在地”。<sup>[1]</sup>其时正值“文革”中间，他的同事们大多被下放到江西一个叫鲤鱼洲的地方从事农业劳动，无人认真料理后事。有人提出许先生是全国政协委员，于是在八宝山举行了简朴的悼念仪式，华罗庚赶来送老友最后一程。俞平伯先生曾撰文纪念：早岁识奇才，讲舍殷勤共听夕；暮年空怅望，云山迢递又人天<sup>[10]</sup>。

## 参考文献

1. 许宝騄，“许宝騄事略”，《道德文章垂范人间》第312-31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 徐利治，“回忆西南联合大学时代的许宝騄先生”，《道德文章垂范人间》第325-332页。
3. 江泽培，“深切怀念许宝騄老师”，《道德文章垂范人间》第333-335页。
4. Anderson, Chung & Lehmann, “许宝騄 1910-1970”，《道德文章垂范人间》第34页。
5. 张尧庭，“深深的怀念——我所知道的许宝騄先生”，《道德文章垂范人间》第344-356页。
6. 郑忠国，杨瑛，“许宝騄先生的青少年时代——俞润民先生访问记”，《道德文章垂范人间》第318-320页。
7. 许宝騄，“给 Herbert Robbins 的信”，《道德文章垂范人间》彩页第7-8页。
8. 姜伯驹，“前言”，《道德文章垂范人间》第1-2页。
9. 杨路，“许宝騄”，[www.minge.gov.cn/txt/2008-09/27/content\\_2496648.htm](http://www.minge.gov.cn/txt/2008-09/27/content_2496648.htm)，民革中央网页。
10. 俞平伯，纪念题字，《道德文章垂范人间》彩页第12页。



## 作者介绍：

陈大岳，复旦大学数学系毕业，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博士，现为北京大学数学学院教授。



## 许宝騄 1910-1970

许宝騄 1909 年生于北京（译者按：应为 1910 年 9 月 1 日出生），1933 年获清华大学学士学位。1936-1940 年就学于伦敦大学的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在那里于 1938 年获博士学位（Ph.D），1940 年获科学博士学位（DSc）。他从伦敦返回中国后，任教于北京大学数学系。

战争年代生活是十分困难的（1943 年-1944 年许先生给奈曼（Neymann）教授的信中曾提到过挨饿之事），但许先生仍然坚持研究。1945 年他到达美国时，刚好赶上参加第一届加州伯克利大学（Berkeley）概率统计会议。在那里教了一学期的书后，接着又到哥伦比亚大学教了一学期的书。刚好这一年 Hotelling 教授由哥伦比亚转到北卡罗莱纳大学（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筹建统计系，Hotelling 就把许先生带到北卡，许先生在那里拿到一个副教授的职位。之后，尽管众多的统计学家鼓动他留在美国，最后他还是回到了北京大学任教。

北京大学的段学复教授通知我们，许宝騄先生于 1970 年 12 月 18 日于北大的家中去世。他死于肺结核。学校为他开了追悼会。

许宝騄出身于杭州的官宦之家，并在北京长大。由于他的出身背景，他讲的是一口具有幽默感的官方普通话。从风度和气质来看，他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他所受的英国教育，使他偏爱上数学。他在数学研究中的风格是倾向于困难但具体的研究，而不是一般而抽象的研究。他学术上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但是作研究工作可以着魔。他经常感到生活中的广泛爱好与献身科学之间的矛盾。他非常喜欢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一起交流，同

时也十分爱好传统的中国文学。他的一个特别爱好是与一部分昆曲爱好者一起欣赏古典昆曲的美好旋律。可能是由于健康的原因，他终身未婚。他于 1947 年夏回到中国，希望成为即将成立的新社会的一个成员。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但他仍然坚持在他的房间内进行治疗。他的中国同事们在他最后告别仪式上，对他表示最深切的敬意。除了他的著作和少数几个朋友提供的一点消息外，关于许先生在解放后 20 多年的生活和工作，我们可以说是一无所知。许先生的学生回忆起他来，都认为他是一个对人忠诚、温和又含蓄的人。他的个人生活很严谨，但作为一个教师和科学家，对人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他在北卡罗莱纳大学的学生 Isadore Blumen 写道：“许先生坚持简洁，对事物深刻的了解，不畏避困难，凡事追求高标准，这些优秀品质深深地吸引着他们，而成为他的学生。” Ralph Bradley 回忆起许先生的讲课，认为他的讲课是将来的典范。Herbert Robbins 评价许先生时说“他是不可被忘记的，同时又是无人能替代的”。对于他的一些学生来说，尽管许先生不是他们正式的博士导师，但许先生对他们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在许先生来美国之前的钟开莱、冷生明、王寿仁等人，来到美国之后的 Isadore Blumen、Albert Bowker、Erich Lehmann 和 Ingram Olkin 等人，都得益于许先生的指导。

许先生的统计工作主要集中于单变量和多变量线性模型的统计推断以及相关分布理论。既有小样本的，也有渐近理论。关于他的统计和概率方面的工作，另有专题作详细介绍。



编者按：这是 T. W. Anderson（上图：美国科学院院士），钟开莱（中图：著名概率论学者）和 E. L. Lehmann（下图：美国科学院院士）文章的译文（郑忠国译）。原文“PAO-LU HSU 1909-1970”载于顶级统计学期刊 *The Annals of Statistics*, 1979 年第 7 卷第 3 期第 467 页至 470 页。

## 深深的怀念——我所知道的许宝騄先生（节选）

张尧庭

他对科研工作的评价有他自己的标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下面两段话：“一篇文章的价值不是在它发表的时候得到了承认，而是在后来不断被人引用的时候才得到证实。”“我不希望自己的文章登在有名的杂志上因而出了名；我希望一本杂志因为刊登了我的文章而出名。”

斯坦福大学的统计系走廊中，悬挂着许的画像。

许宝騄先生把数学家分成三流：“第一流的数学家，是有天才的，他们能开创新的领域，这些人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第二流数学家是靠刻苦学习而成的，认真消化整理前人的东西，在这个基础上有所创造发现，这种工作对后人影响较大，中国缺少一批做这一类工作的人。第三流的数学家只在某一、二个问题上有一点贡献，不能象第二流的那样有系统的工作。剩下的就是不入流的数学家了。”

我是1955年认识许先生的，第一次见到他是他来给我们班上“概率论”的课。记得第一堂课还没开始，教室里坐满了人，其中相当一部份还是从外校赶来的，有的年龄也不小了，只听说许先生课讲得非常好，概率论的课还是第一次开，所以听众很多。上课铃响后，许先生进来了，手里提一个小的草包，里面放着自备的黑板擦、一个小暖瓶和一只杯子。我心想，大教授上课还带自己的黑板擦，和别的教师就是不一样。讲课开始了，声音不大，但很清楚，一堂课下来，说真的，当时并没有感到他讲课的特别之处。每次擦黑板时，看他额上沁出颗颗汗珠，这时才体会到他的身体的差，为什么他要自己带特制的轻巧的黑板擦。讲了三次课后，他因身体不行，就不再上了，这样课由赵仲哲先生一直讲到完。自那以后，许先生再也没有在教室中上过课，我们这一班同学是听他在教室中上课的最后一班学生。

1960年代初，他对我谈起他自己的希望，他说：“30年代末期，我在英国留学，当时有三个中国人在那里学统计，日本也有三个人在那里学，可是我们三个中国人（许、唐培经、徐钟济）比日本人强多了。那时日本已侵略中国，我们想，在统计、概率方面，我们将来回国之后一定把它搞好，超过日本人，当时很有信心。”我感到他的这个想法一直是指导他的行动的准则。快解放时，他急于回国，其中就有想回来后好好干一番科学事业的愿望。即使到了文革时期，他已病在床上，还对探望他的亲友说：“我身体不行了，不能动了，但我的头脑还是很清楚的，我还可以用脑子为祖国服务。”可见他念念不忘的还是想尽自己的力量，振兴国家的科学事业。

他自己一生发表的论文，篇数并不算多，总数不超过40。他对自己的工作要求很严，一个问题在他的手中没有彻底解决好，他往往不肯放手。他对科研工作的评价有他自己的标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下面两段话：“一篇文章的价值不是在它发表的时候得到了承认，而是在后来不断被人引用的时候才得到证实。”“我不希望自己的文章登在有名的杂志上因而出了名；我希望一本杂志因为刊登了我的文章而出名。”

他很想办一个概率统计的杂志，目的是可以让一大批年青的人有发表作品的地方，让世界其他国家同行了解到我们中国的工作。他愿意拿出他的积蓄来创办一个杂志。后来由于文化大革命，这事也就成了泡影。

1983年冬天，我访问威斯康星大学统计系时，系里年龄最大的教授盖兰，他要求系主任一定安排出一段时间让我能与他个别谈谈。他告诉我他是P.L.许的学生，那时许在伯克莱大学执教，许很高兴留他作为助教，他对许的帮助和信任终身难忘。许宝騄先生在美国的几所有名的大学，都教过一些学生，伯克莱、哥伦比亚和北卡罗莱纳等大学都有他的影响。斯坦福大学的统计系走廊中，悬挂着许的画像。

他对于发表文章要求是严的，他自己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他认为一篇文章不在于它的长短（顺便说一句，他的论文最长的有五十页，最短的只有一页多一点，内容是举一个反例），而在于它是否真正有内容。他不希望我们稍有一些结果就满足于此，而急于发表，应力求把问题做到底，敢于去碰难处，要知难而进。对写文章的要求是不要罗嗦，而要把关键之处交待得



明明白白，他很不欣赏那种在关键之处一带而过，写“显然”两字的那种文风。他告诉我们：“良工示人以朴。”要把自己的想法、技巧都告诉别人，以便交流。

许宝騄先生把数学家分成三流：“第一流的数学家，是有天才的，他们能开创新的领域，如柯尔莫哥洛夫，冯·诺依曼，维纳这一类人，这些人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第二流数学家是靠刻苦学习而成的，认真消化整理前人的东西，在这个基础上有所创造发现，象辛钦这样的数学家就是这一类的，他写的《公用事业理论的数学方法》、《信息论基础》等就是消化整理的结果。这种工作对后人影响较大，年青人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较快地进入科学的前沿，中国缺少一批做这一类工作的人。第三流的数学家只在某一、二个问题上有一点贡献，不能象第二流的那样有系统的工作。剩下的

就是不入流的数学家了。”他认为自己没有才能，是刻苦学习得到的，他也没有经验去培养有天才的人，他只能传授如何认真学习，努力钻研，埋头苦干的经验。他衷心希望他的学生超过他，一次他在讨论班上说：“自古以来，只有做状元的老师是光荣的，做状元的学生是没有什么的。”

他衷心希望他的学生超过他，一次他在讨论班上说：“自古以来，只有做状元的老师是光荣的，做状元的学生是没有什么的。”



### 作者介绍：

张尧庭（1933-2007），我国著名统计学家和统计学教育家，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并留校任教，1976年调离，曾任武汉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武汉市科协副主席，中国统计学会理事，上海财经大学资深教授。

## 纪念先师许宝騄诞辰一百周年（节选）

胡迪鹤

### 佟府丙八号

一进北京大学的西校门，走过两颗银印似的方水池中间的石拱桥，举目望去，是一对庄严肃穆的华表屹立在一片碧草如茵的广场中，一座雕梁画栋的宫殿式建筑坐落在广场正东方，那就是北京大学标志性建筑，办公大楼了。从北京大学办公楼往东南行约五六百米，但见柳林深处，点

缀着几棵丁香和翠竹，其中坐落着几栋小平房，有的形似老北京的四合院，有的由门字形的三排平房组成，这就是鲜为人知的佟府。

不少人知道北京大学一批著名学者的寓所的园区，如燕南园、燕东园、镜春园、朗润园、蔚秀园等等，但很少人知道，还

没有多少人知道，住在这样简朴的居室，过着如此清贫的生活，忍受着如此的孤寂，竟然是为我国科学事业辛勤耕耘一生的一代学术宗师许宝騄先生。



有个佟府，就是北京大学的师生员工，知道的也不多。

许宝騄先生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到1970年他去世，就一直住在佟府丙八号。这是一所两廊四间的小平房。一进门是一个临时封闭起来的托檐，不到四平方米，用作厨房。由此前进，是一条由北向南的走廊，尽头是一间贮藏室，东西两侧各有两居室。西侧较大，住着张景昭老师一家，东侧两间较小，进门一间大的，也只有十三四平方米，算是许先生的客厅，里面的套间就是卧室和卫生间了。先生的客厅，其实是一个多功能厅。厅内东面墙上，挂着一块黑板，北面放着两个齐屋顶高的书架和一把双人沙发，西南各放置一把单人沙发，中间是一张一米见方的矮桌，厅内还放着几张小凳和几个竹壳热水瓶。先生主持教研室的讨论班时，这个客厅就是教室；教研室要政治学习或讨论问题时，它变成了小会议室；查阅资料时，它变成了图书馆；先生用餐时，它又变成了餐厅；只有外客来访或学生向先生问问题，这间小屋才恢复原来的角色——客厅。

先生很少在客厅工作，绝大部分时间

在卧室工作。靠坐在床上，在一块一尺见方的薄板上把稿纸展开，撰写论文和讲稿。由于睡眠情况不好，黎明前就开始工作，晚上无人照顾，饿了就用一块巧克力和一杯热开水充饥，“三年困难期间”，巧克力也随之困难掉了。累了就听听收音机，然后再睡一会。卧室中总是放着一台“熊猫牌”收音机，这是先生了解时事和休闲的主要工具。对京昆艺术这类国粹，先生非常喜爱，有深入的了解和典雅的鉴赏力，据说青年时代还曾粉墨登场。

先生上世纪五十年代，寒暑假还到北京城内的宾馆疗养一两个星期，六十年代以后，几乎是足不出户。先生自患肺病后，身体一直瘦弱，无论春、秋、冬，在室内总是穿着长衫和毛裤，只有外客来访，才着正装。

没有多少人知道，住在这样简朴的居室，过着如此清贫的生活，忍受着如此的孤寂，竟然是为我国科学事业辛勤耕耘一生的学术宗师许宝騄先生。

如今的佟府丙八号，早已是人去房毁，若仅是人去房空，还可以去那里凭吊先生，现在，只能把崇敬和谢恩之情永铭心间。

许先生在统计推断和多元分析等方面做了一系列理论性开创性工作，把许多数学中的分支，如矩阵论、函数论、测度论等引进统计学，使统计学中的许多问题的理论基础更加深厚，逐渐形成了统计学中的一个主流方向——数理统计。

LINK

相关链接



许宝騄(右)与著名数学家H. Cramér(中)、著名统计学家M.S. Bartlett(左)在美国的Chapel Hill(1946年)。

## 望尽天涯路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是晏殊在他的蝶恋花一词中唱出的佳句。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认为做学问，首先要有这种远大的目光，崇高的境界。

上世纪三十年代末期，苏联数学家柯尔莫哥诺夫(Kolmogorov)奠定了概率论的公理化系统的基础，这为许多数学工具引入概率论开辟了道路，从而使近代概率论以崭新的面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也就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统计学，特别是各种专业统计，例如生物统计、医药统计、农业统计、工业统计首先在英国迅速发展，得到广泛的应用。当然，在统计学中，统计思想，例如选定统计模型、设计统计推断方案等等非常重要，但统计量的选取及其分布的计算，统计误差分析等理论问题也是很重要的。当时许先生正在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著名统计学家奈曼(Neyman)。此后的几年间，许先生在统计推断和多元分析等方面做了一系列理论性开创性工作，把许多数学中的分支，如矩阵论、函数论、测度论等引进统计学，

使统计学中的许多问题的理论基础更加深厚，逐渐形成了统计学中的一个主流方向——数理统计。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研究机构和一些大学里，统计学往往被称之为数理统计。其实把数理统计视为统计学的一个主要分支似乎更妥当些，可以说，许先生是数理统计这一方向的奠基人之一。

回国以后，虽然学术环境不如国外优越，资讯迟缓，学术交流稀少，学术梯队不健全，但许先生仍竭力站在学术前沿来从事研究和培养人才。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经典概率极限理论与随机过程论，正处在一个蓬勃发展时期，先生在继续数理统计的前沿研究的同时，积极组织队伍对概率论的两个前沿领域：独立随机变量族的极限理论和马尔可夫过程论进行研究。一般人认为Gnedenko和柯尔莫哥诺夫所著的“相互独立随机变量之和的极限分布”(原版为俄文著作，英译本为钟开莱译，中译本为王寿仁译)是经典概率极限理论的一个总结，其实许先生获得过有关此方面的许多

就是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下，在1941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许先生在顶级统计学期刊Biometrika、伦敦数学期刊(J. London Math.)、数理统计年鉴(Ann. Math. Stat.)等许多国际权威性刊物上发表了十多篇有关数理统计等方面的开创性文章，成为国际上数理统计这一方向的奠基人之一。



重要结果，有的正式发表出来了，有的由于当时国内资讯迟缓，外国人抢先发表了。

### 拳拳赤子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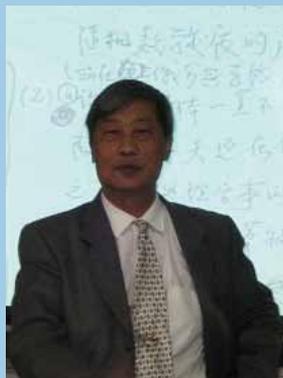
1940年，抗日烽火正在祖国大江南北熊熊燃烧，抗日战争处于最艰难的时候，许先生在英国伦敦大学学院获得双博士学位后，放弃优越的学术环境和生活条件，毅然返回祖国，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当时昆明的工作条件和待遇极端艰苦。图书资讯极端贫乏，连教材都少有，学生听课主要靠记笔记，相当一部分教师和学生租住在农家茅篱竹舍。就是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下，从1941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许先生在顶级统计学期刊 *Biometrika*、伦敦数学期刊 (*J. London Math.*)、数理统计年鉴 (*Ann. Math. Stat.*) 等许多国际权威性刊物上发表了十多篇有关数理统计等方面的开创性文章，成为国际上数理统计这一方向的奠基人之一。他曾经说过，我们在某杂志上发文章，不是借该杂志来标榜我们的学术水平，应该让我们在该杂志发表了文章来抬升此杂志的地位。先生这样说了，也确实这样做了。

为了迅速发展我国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学科，北京大学一枝独秀是不成的，必须在全国主要地区都有一支强大的概率统计的教学和科研队伍。当时全国在概率统计的人才分布和研究水准很不平衡，而且总体水准也不高。在这种背景下，只有集中优势，全国协调，才能尽快缩小与国际水平的差距。为此，1956年秋，把中科院数学研究所的王寿仁和张里千，中山大学的郑曾同和梁之舜借调到北京大学任教（当时江泽培、胡国定、王梓坤诸先生正在苏联留学）。与此同时，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抽出34名四年级学生，从中山大学和南开大学各抽调10名四年级学生来北京大学培养，此外北京大学还接收全国各主要综合大学的概率统计方面的教师来进修。这样一支具有七八十人，老中青齐全的学术梯队就组建成功了。不能不说，这样的大手笔，非许先生难以举此帅旗。许先生亲自主持“独立随机变量族的极限理论”的讨论班。此讨论班的相当一部分内容，后来都成为培养概率论专门化学生（相当于现在的硕士生）的教学内容。在这个由北大、中山、南开三所大学的54名学生，以及部分综合大学进修教师组成的培训班，系统地学习了“测度论”、“概率极限理论”、“马尔可夫链”、

“数理统计”等课程。这是我国第一批培养的数量可观的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人才。本文作者也是这批培养的学生之一。自此以后，全国各综合性大学绝大多数都设有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研室。

讨论班，这是交流学术信息，产生创作灵感，介绍前沿研究成果的平台。许先生在这个平台上，不仅发挥了上述种种功能，而且还把它变成了系统讲授一个研究分支的课堂。先生在1956年和1957年，主持“独立随机变量族的极限理论”讨论班，不仅使我们对经典概率极限理论有了一个整体性的了解，而且也为教学工作积累了一份很有参考价值的素材。1958年以后，先生主持着三个讨论班：数理统计、马尔可夫过程、平稳过程。参加讨论班的人员，不仅有北京大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研室的师生，还有校外的一些人士。不是先生这样的学术泰斗，焉有如此魄力与才气。1963年，许先生在讨论班上给我们系统讲述的“点集拓扑”，无论从教学技巧、形式逻辑的应用、教材内容的精选，都使我们受益匪浅。

#### 作者介绍：



胡迪鹤，195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并留校任教。1972年调至武汉大学，历任讲师、教授、数学系主任、数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学会第一届常务理事。著有《分析概率论》、《可数状态的马尔可夫过程论》、《随机过程概论》、《一般状态马氏过程分析理论》。